

前言

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事实上，道未行，夫子也未曾离开。不过，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倒是越过了大海，传播到日本。

《论语》传日以后，历受重视，久为研读，乃至融入到日本的文化血液当中，潜移默化岛国国民的言行和思维方式。可以说，《论语》是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的中国典籍。然而，及至近代，西学东渐，传统衰微。《论语》的际遇也变得颇为微妙了。日本著名学者和辻哲郎将孔子与释迦牟尼、耶稣并称为“人类的教师”^①，加藤周一慨叹“《论语》已非日本人共通的经典”^②。一方面，孔子思想的影响已然融入人心。另一方面，《论语》的经典地位日渐消减。赞叹与慨叹之间，仿佛如实地映射出《论语》和孔子思想在近代日本的命运。

经典地位的崇高与消减，往往与学术研究密不可分。综观日本近代学界的《论语》研究，注疏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实证者有之，解构者有之，误读者有之，歪解者有之。可谓异象纷呈，玉石混杂。这就需要我们下功夫去甄别，以免受人迷惑。当然，这些都是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与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反映着日本人研究与利用《论语》的情况。这既是论语学在海

① [日]和辻哲郎. 孔子[M]. 东京: 岩波書店, 1988.

② [日]加藤周一. 日本文学史序説補講[M]. 东京: かもがわ出版, 2006: 238.

外的延伸，也是日本近代文化构建的重要一环。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论语》在近代日本的研究与传播情况，也可以从人文学术层面透视日本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当然，这是一项十分复杂而且难度巨大的研究工作。不过，事在人为。王晓平先生在《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序言中说道：“在经典面前，无需屈膝跪拜与献上廉价的赞辞，只需要与之展开诚挚的对话与沟通”^①。诚哉，斯言。对于日本学者的《论语》研究，也正需要这样的学术精神与研究路数。我们可以暂且把赞扬与贬抑放在一边，将推崇与批评搁置一旁，以理性的学术精神，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解析文本。文本既明，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在近代日本的学术与文化语境中，《论语》研究的态度、目的、方法、内质等已经与传统学术大相径庭。近世传统的日本论语学主要有古注解读、朱注讲释、古义学、古文辞学、折中考证等接受与研究的形态。这些与中国传统论语学的关联甚为紧密，大致上构成正相关关系。但是，近代以来的日本《论语》研究不仅积极采纳近代西方的学术方法，而且多以构建日本的近代学术和文化为旨归，与中国论语学的关系更近似于一种平行的关系。两者处于相似的文化语境中，面对相近的课题。两相比照，殊为有趣。对近代日本论语学的考察，或许也有助于我们反观近代中国论语学的实相。

鉴于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对日本近代论语学进行考察，即“一个切入点”“两个介入”“三个维度”“四个新变”。

“一个切入点”，是指学术文化思潮对《论语》研究的影响作用。一代学术之变，自然是论语学内在发展的趋势使然，但外来学术文化思潮无疑会起到巨大的催化剂作用。怀疑论、实证论、兰克史学、近代国家主义等学术思潮与文化观念对《论

① 王晓平：《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4：“序”3。

语》的研究与诠释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论语学的重要论著也因此带有鲜明的近代学术性质，如山路爱山《孔子论》、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宫崎市定《论语之新研究》、津田左右吉《论语和孔子的思想》等都是如此。此外，服部宇之吉所鼓吹的“孔子教”及其《论语》诠释，也是在近代国家主义与日本本土皇权论的综合浸染下形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学术文化思潮正是牵动近代日本论语学的一条线索。以此为切入点，或许会有纲举目张之效。

“两个介入”，一是近代日本文化语境对《论语》研究的介入，二是《论语》研究对近代日本文化构建的介入。近代日本的《论语》研究与诠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在古今东西多种学术思潮与文化观念的综合作用下，日本人从本民族文化和本国意识形态出发，对《论语》进行了现代性的、学术性的研究，也展开了包含民族特性与时代属性的解读尝试。这其中，有西方实证主义学术观念、方法与传统论语学相结合的有益实践，有疑古辨伪思潮走向极端后的《论语》解构和对孔子语录材料的否定倾向，也有近代国家主义、皇权论等偏离学术的异化，还有针对歪曲利用《论语》和儒学的官方学术体制而进行的批判。这些独具异色的研究与诠释，是近代日本文化语境介入论语学的结果，同时，也是论语学介入近代日本文化构建的途径。这种双向介入是近代日本论语学最为显著的新变，也是最为紧关节要之处。

“三个维度”，是指本研究拟在论语学、历史学、比较文化这三个维度上进行考察。首先，在论语学的维度上，采取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策略。我们既从学术思潮、文化构建等角度进行综合审视，又选取几种代表性学术论著加以细致考察。尤其注重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来考察《论语》的文献批评与思想诠释的内在特质。其次，在历史学的维度上，与近世传统论语学相参照，把握学术文化思潮激荡与递变之中的近代

日本《论语》研究与诠释。再次，在比较文化研究的视域中，探究《论语》在近代日本的际遇。近代日本的《论语》研究与诠释是论语学的一支，但在本质属性上，属于日本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乃至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向。因此，我们可以借此来审视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考察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四个新变”，是指论语学在近代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态度之变”“目的之变”“方法之变”“实质之变”。

第一，态度之变。日本传统汉学奉《论语》为经，不敢持有丝毫怀疑态度。近代学术则因受到怀疑论哲学的影响，将《论语》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学术考察。如山路爱山对《论语》文献价值的论定，武内义雄对《论语》源流的考察，宫崎市定对《论语》原文的质疑，津田左右吉对《论语》中孔子语录材料真伪的文献批评等，都是研究态度转变的体现。

第二，目的之变。近代日本的《论语》研究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同时也顺应了本国近代文化构建的时势，其研究目的已大不同于传统经学。如武内义雄的考察是出于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目的，津田左右吉的研究有刻意抹杀《论语》及孔子学说对日本文化影响的嫌疑，服部宇之吉鼓吹孔子教的真实目的在于为皇权政治乃至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庇佑。

第三，方法之变。传统经学主要采用注疏的手段，近代论语学则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注重引入实证主义、兰克史学、现代语言学等西方近代学术方法。如武内义雄以实证论治“原典批判”式文献学研究，宫崎市定综合运用西方史学与语言学手段对《论语》的原文及训诂等提出质疑。

第四，实质之变。传统的日本人研读《论语》的实质不外乎增厚学殖、资于治道，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则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论语》重新诠释，并且从人文学术视角参与近代日本文化的构建。大体而言，武内义雄、宫崎市定等的研究具有

较为纯粹的学术意义，而津田左右吉、服部宇之吉等则是在学术的名义下，对《论语》进行别有用心的诠释。津田借助文献批评的学术手段，对孔子学说体系进行否定和瓦解，其实质意图是欲抹杀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服部大肆宣扬孔子教，实质上是在参与构建以天皇体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津田的否定与服部的极赞貌似大相径庭，其背后都隐藏着浓烈的狭隘的民族意识。

近代日本的《论语》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学术文化现象综合体，相关文献汗牛充栋。全面把握实非易事，但问题终究要一个一个解决。因此，笔者拟选取几种有代表性的论著，作为个案研究的具体对象。如山路爱山《孔子论》、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宫崎市定《论语之新研究》、津田左右吉《论语和孔子的思想》、服部宇之吉《孔子及孔子教》，这几种论著是在近代日本文化语境中形成的重要论语学著作，也正是怀疑论、实证论、近代史学以及近代日本皇权论等学术思潮与文化观念综合作用的产物。通过对这些论著的考察，相信能够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较为准确地把握近代日本论语学的新变。此外，还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竹添光鸿的《论语会笺》是论语学史上的煌煌巨作，但就其内容而言，无疑是传统注疏研究的余绪，因此并未纳入本研究的考察视野。此外，书末附录论文「万葉歌人山上憶良の歌意への『論語』の投影」一篇。此文是笔者在日本奈良县立万叶古代学研究所访学期间所撰，可资于管窥奈良文人对《论语》的接受情况。

小论之于近代日本论语学，或如一粟之于沧海。笔者寡陋，所为止于管窥蠡测而已。若能为论语学、日本学研究添一参考，则不胜荣幸。同时，笔者学识浅薄，才思偏狭。文中料多不备，难免不当。若得方家批评，实怀感激。

业师王先生晓平人格美好，沉潜学问。硕士研究生阶段导师崔香兰女士淡泊名利，醉心于学术。二位先生，学恩深厚，

难以言谢。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孟昭毅教授、曾艳兵教授、曾思艺教授、黎跃进教授、赵利民教授多有指导，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赵季教授、刘雨珍教授在学位论文开题和答辩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大连外国语大学陈岩教授、刘利国教授指点并推荐我投入王老师门下。谨致谢忱！

同门学友曹志伟博士、苟艳君博士、孙立春博士、赵莹博士、刘九令博士、孙士超老师、闫朝华老师，每每交流，多受启发；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永鹏老师、周宝东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处任晓丽博士、学科办刘乃忠博士为本研究顺利完成费心费力。谨致谢忱！

本书付梓，承蒙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倾力襄助，尤其得益于王壮副社长以及责任编辑郑文全老师的辛苦工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杜红坡先生亦多有建言。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李瑞雪、董欣荃参与文稿校对。谨致谢忱！

2015 年 10 月吉日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研究现状.....	3
三 题解.....	5
四 研究内容及方法等.....	9
第一章 近代以前日本《论语》研究要略.....	14
一 日本《论语》接受的流变轨迹.....	14
二 日本江户时代《论语》学流变轨迹.....	33
第二章 学术思潮与《论语》研究要略.....	55
一 “学问《论语》”与文化构建.....	56
二 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潮.....	58
三 影响日本近代《论语》研究的主要学术思潮.....	60
四 学术思潮影响下的日本近代《论语》研究代表作.....	63
五 小结.....	65
第三章 理性怀疑——论山路爱山的《论语》文献批评.....	66
一 井上哲次郎及其《敕语衍义》.....	66

二	山路爱山《孔子论》及相关先行研究.....	70
三	山路爱山孔子研究中的文献批评.....	72
四	山路爱山文献批评的得失.....	81
五	小结.....	84
第四章	“原典批判”——武内义雄的《论语》探源.....	86
一	伊藤仁斋的上下二论说.....	87
二	市村瓚次郎的正编、续编、杂编说.....	89
三	武内义雄的《论语》探源.....	91
四	武内义雄《论语》“原典批判”研究的意义及启示.....	95
五	小结.....	99
第五章	史家训诂——宫崎市定《论语》本文质疑之质疑.....	101
一	考证与质疑.....	102
二	史学维度.....	105
三	语言学维度.....	109
四	质疑之质疑.....	110
五	小结.....	117
第六章	口是心非——津田左右吉《论语》文献批评之批评.....	118
一	津田论语学相关先行研究.....	119
二	津田的《论语》文献批评.....	122
三	还原? 否定?.....	125
四	是耶? 非耶?.....	129
五	小结.....	131

第七章 沐猴而冠——论服部宇之吉孔子教的实质.....	133
一 孔子人格与“知天命”.....	134
二 中国革命与“日本之新文明”.....	139
三 荒诞邪恶的“日本帝国之天命”.....	143
四 “孔子之徒”对“孔子人格”的背离.....	148
五 小结.....	150
第八章 日本近代论语学的再认识.....	152
一 学术思潮对日本近代论语学的影响.....	152
二 科学与荒谬——日本近代论语学的双重性格.....	164
附 录.....	174
万葉歌人山上憶良の歌意への『論語』の投影	174
参考文献.....	196
后 记.....	200

绪 论

一 研究缘起研究起

在东亚文化史上，不同地域间的发展程度差异比较大，交流很频繁。中国文化形成较早，发展程度最高，并向周边地区辐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安南等周边地区文化后进，积极摄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并使之合流于本土文化。周边地域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萃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与递变中，东播日本列岛。日本在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摄取和本土化中，不断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是书籍。当然，这种书籍的交流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向日本的单向流动。流向日本的汉籍数量庞大，种类也较多。大概九世纪时，隋唐典籍几乎一半便已流布日本^①。其中影响日本民族与文化最为悠久、最为巨大、最为深远的，当首推《论语》。《论语》传日以后，历受重视，久为研读，乃至融入日本的文化血液，广泛而且深刻地潜移默化岛国居民的语言行为、思维方式，乃至整个精神世界。

日本的知识层十分热衷于研究《论语》。千数百年来，积淀日益丰

① 严绍璦.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20.

厚，蔚为大观。近代以前的日本《论语》研究虽然已经具有一定的民族特性和时代属性^①，但与中国学术的关联仍然至为紧密，所受影响也极其巨大。然而，大抵在明治维新前后，这种情况悄然生变。

正如王晓平先生所言，“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②。近代的日本处于古今东西文化与学术思潮交汇与激荡的漩涡之中，研究《论语》的目的、方法、态度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既和传统经学大不相同，也和中国论语学迥然相异。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依然存在，但西方文化观念与学术方法更是大行其道。而且，在东西方学术思潮的综合作用下，日本的《论语》研究越来越呈现出更为鲜明而且浓厚的民族特质与时代属性。例如，实证主义对《论语》研究的影响可谓大矣。狩野直喜将清考据学与西方实证论综合运用于中国典籍研究，武内义雄以实证主义方法治《论语》的“原典批判”研究，宫崎市定从历史学和语言学角度质疑《论语》本文及训诂。又如，怀疑主义也以各种形式发挥影响作用。山路爱山以较为理性的怀疑精神进行文献批评，并以独立的思考对当时的“官学体制”予以犀利的批判；津田左右吉由怀疑主义出发对《论语》进行文献批评，但却走向过度怀疑和虚无的中国文化否定论。再如，日本皇权政治论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作用于《论语》的诠释。最具代表意义的是服部宇之吉，他通过鼓吹孔子教为天皇政治和军国主义造势。如此种种，近代日本的《论语》研究，在近代学术与文化思潮的浸染下，呈现出与传统论语学迥然相异的新态势。

日本近代的《论语》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综合体。它既与传统论语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又颇具近代学术性质；它处于东西学术

① 张士杰. 日本《论语》接受的流变轨迹 [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1(1): 78—85.

② 王晓平. 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中国学文萃》总序 [N]. 中华读书报, 2006-07-05(18).

与文化交汇的漩涡之中，反而彰显出鲜明而浓厚的日本民族特性。王晓平先生在《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总序”中指出，“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①。诚然如斯！日本近代的《论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左右着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和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同时，也可能成为我们审视与解读日本学术、日本文化、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一条终南捷径。

从这种意义上讲，日本近代的《论语》研究天然地具有双重性质与双重效用。它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扇窗子。对照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审视论语学在近代日本的成像。透过这扇窗子，我们可以观察近代日本的学术与文化景观。

二 研究现状

日本人研读《论语》的风尚颇盛，相关文献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中日两国学界对日本的《论语》研究情况有一定关注，其中有的论著论及近代部分的一些问题，不乏真知灼见，可资参考。

我国学者对日本《论语》研究的关注较早。清人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曾引用荻生徂徕《论语徵》中的观点，《四库全书》中收录了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和根本武夷校订的皇侃《论语义疏》，清末黄遵宪曾在《日本杂事诗》中提到日传皇疏的情况。当代学人在日本儒学、孔学、汉学（中国学）等关联领域的研究中，也有人曾论及日本近代的《论语》研究情况。

① 王晓平. 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中国学文萃》总序 [N]. 中华读书报, 2006-07-05(18)

日本学者研究《论语》的热情十分高，也颇关注我国《论语》学术史，并有通论日本《论语》接受史、学术史类论文数篇。关于近代的研究情况中，也可见一些针对个别学术现象的个案研究。

笔者按照与本研究的关联度，将国内外相关先行研究成果加以分类、归纳，并简述如下：

第一，关于近代日本《论语》研究的成果多为个案研究论文。如市村瓚次郎的《论语和教育敕语》（载《汉学》第2编4号，1911年）、川上清美的《津田博士的论语研究》（载《斯文》复刊第24号，1959年）、原田种成的《安井先生和论语》（载《汉文教室》第54号，1961年）、松川健二的《论语集注和吉川论语》（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7卷2号，1989年）、古贺胜次郎的《安井息轩的儒学》（载《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第6卷3号，2006年）、张士杰的《试论山路爱山的孔子研究——以〈孔子论·材料论〉为例》（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03期）等。

第二，通论日本《论语》接受与研究的相关论著中，有的涉及近代部分。如日本学者林泰辅的《我邦论语之实行与研究》（载《孔子祭奠会会报》第10号，1917年）、武内义雄的《日本的论语之学》（见《武内义雄全集》第4卷，角川书店，1979年）、西川阳子的《近代的〈论语〉》（见加地伸行编《论语的世界》，新人物往来社，1985年）、町田三郎的《日本之〈论语〉研究》（载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七卷第三期，1997年）、我国台湾梁容若的《千七百年来日本的论语研究》（见梁容若《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概观》，艺文印书馆，1972年）、张士杰的《日本〈论语〉接受的流变轨迹》（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年01期）等。

第三，日本儒学、汉学（中国学）等关联领域中，有的成果涉及近代日本《论语》研究。专著主要有日本学者宇野哲人的《儒学史》（宝文馆，1924年）、我国学者严绍璁的《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严绍璁的《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王晓平的《日本中国学述闻》（中华书局，2008年）、李庆的《日本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浙

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刘岳兵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 年)、刘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中华书局, 2004 年)、张崑将的《东亚论语学: 韩日篇》(台大出版中心, 2009 年)等, 论文有早川光三郎的《论语和川柳》(载《支那哲学杂志》第 8 号, 1930 年)、新秀保美的《影响日本文学的论语》(载《东京学艺大学研究报告》第 6 辑, 1955 年)、曹先锐的《日本人对论、孟、学、庸的研究》(载《学粹》第 1 卷第 3 期, 1959 年)等。

第四, 另有几种《论语》相关文献目录类书籍。如日本学者濑尾邦雄的《孔子孟子相关文献一览》(白帝社, 1992 年)和《孔子〈论语〉相关文献目录(单行本篇)》(明治书院, 2000 年), 两书将明治以降《论语》相关论著按时间序编目分条罗列。又如林庆彰的《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1993 年)中专设“孔子与论语”一门, 辑录 1900 年至 1992 年间的孔子及《论语》相关论著二千余种。这三部目录类书籍为检索本研究所需的资料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

综上, 中日两国学界的相关先行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于本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然而, 从近代论语学的角度来说, 研究现状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 若仅凭个案研究, 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近代日本《论语》研究的状况、流变及特质等问题; 其次, 受限于篇幅和结构安排, 通论类论文难以对近代部分展开详细而深入的论述; 再者, 因主要论题、篇幅等原因, 关联领域的论著较难对近代日本的《论语》文献研究与思想诠释做出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解析和论述。鉴于此, 对日本近代《论语》研究情况的系统性梳理与细致考察尤显必要。

三 题解

本研究以“学术思潮与日本近代论语学”为题。这里, 笔者拟对题

目词汇所表达的意义加以解释。

所谓“日本近代”，是空间和时间概念的综合。空间概念上的“日本”意指日本列岛，即对研究主体所属国籍、进行学术活动的地域以及研究成果刊行地等的限定。日本史学意义上的“近代”，一般指明治维新以后至二战结束。然而，文化的演进是很难以某一具体时点做出明确划分的。实际上，学术意义上的“近代”与“古代”并非泾渭分明，“近代”与“现代”也很难断然割裂，乃至广义上的“现代”也是以明治维新为上限的。^①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与学术中也有些许近代性质，^②江户时代儒学者伊藤仁斋所持《论语》上下二论的见解或许也可视作近代学者武内义雄解构《论语》诸篇的思想源头。^③明治时期也有传统汉学意义上的《论语》研究问世，如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虽然刊行于1872年，但实质上可以说是传统注疏研究的总结。^④竹添光鸿的《论语会笺》刊行于1926年，但其学术体例一如清考据学。此两种论著虽然成书于时间上的近代，但似乎更应当归类于文化上的前近代。另外，从学术与文化意义上看，津田左右吉的《论语和孔子的思想》可以视作怀疑主义与文献批评研究的综合作用的产物，宫崎市定的《论语之新研究》可以视作近代实证主义文献批评研究在史学和语言学维度上的延伸。此两种著述分别于1946年、1974年初版刊行，从出版时间上来

-
- ① 刘韶军著《日本现代老子研究》中认为，“大约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在汉学研究领域才出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参见：刘韶军．日本现代老子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7．
- ② 王晓平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论述的范围大致设为中国的鸦片战争略前至五四运动前夕，日本的江户后期至明治时代。近代转型期中的中日文学交流情况错综复杂，著者驾轻就熟地做出顺畅通达的梳理与解析。观其原因，深沉浑厚的学术功力以外，这种不拘泥于历史时期划分的意识或许也是比较重要的。参见：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4．
- ③ 张士杰．日本学者关于《论语》源流的考察[A]．载王晓平．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④ 町田三郎撰，金培懿译．日本之《论语》研究[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7，7（9）：1—15．

看，归入现代更为合适，但在学理上应当纳入近代《论语》研究的考察范围。显然，从学术史与文化史意义上来看，“近代”的史限与其严苛，莫若模糊。变通一些，放宽一点，或许才更符合于实际，才更有益于进行系统的学术观察。因此，出于对史学概念和学术、文化意义的综合考虑，笔者拟将明治维新前后作为上限，将二战结束前后作为下限，并根据研究需要做适当的放宽。

所谓“学术思潮”，主要是就对近代日本学术研究发生较大影响作用的西方学术思潮与文化观念而言的。近代的日本处于古今东西学术与文化思潮激荡的漩涡之中。中国的汉学、宋学、清学的影响依然存在，而实证主义、怀疑主义、批判主义、近代史学、近代国家主义、语言学等西学又随风潜入，日本本土的国粹主义、皇权政治论等也甚嚣尘上。多种思潮各领风骚，几股势力彼此交汇，相与合流，对日本近代的学术发生着错综复杂的作用。当然，这些观念与思潮很难非此即彼地归类于学术思潮，抑或文化思潮、社会思潮、政治思潮等。实际上，文化的意义也相当宽泛，学术的范畴也很难界定。文化往往能够涵盖学术研究及成果，学术一般也可以探讨文化的各个领域。学术往往与哲学、社会、政治等相互渗透，难分彼此。例如，实证论原属哲学范畴，但狩野直喜将其援用于中国典籍的研究。又如，津田左右吉以怀疑主义解构《论语》和瓦解儒家思想，客观上形成对皇权政治理论的批评而受到战后民主论者的赞誉^①。再如，服部宇之吉通过对《论语》等儒典的肆意诠释鼓吹孔子教，实质上就是为天皇政治制度和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庇佑。^②故此，笔者拟将影响日本近代《论语》研究的诸般观念与思潮总括为“学术思潮”一词。虽难免偏狭之嫌，量亦可涵而盖之。

所谓“论语学”，内容宽泛，所涉甚广，大抵包括《论语》书名、编纂者、结集年代、文本变迁、篇章结构、海外传播、影响、名物考

① 池田知久撰，曹峰译．津田左右吉与亚洲[J]．文史哲，2011(3)：75—92．

② 严绍璦．日本中国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441—448．
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2—231．

释、文字训诂、篇章真伪、思想诠释等方面。^①日本的《论语》研究也大体在此范围之内，但又不完全相同。尤其在近代学术思潮的浸润中，更是沾染着浓厚的日本本土气息，铭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例如，山路爱山的孔子及《论语》研究径直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以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等为代表的“官学体制”^②。又如，津田左右吉的《论语和孔子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颇为盛行的中国文化否定论的反映。^③再如，服部宇之吉所鼓吹的孔子教明显是为日本的天皇政治造势。^④诸如此类，大抵可以视为《论语》研究这粒种子在日本的学术、文化土壤与气候环境中生发出的变异株苗。本研究以近代日本的《论语》研究为考察对象，专注于那些颇具日本特质的代表性论著。

日本《论语》研究在近代学术与文化语境下呈现出的变化、形态，以及有别于近代以前的一些动向与趋势。《论语》在传播到日本列岛后，一直受到知识层的关注。诸如读解、讲释、尊崇、批判、考证、诠释等等，形式多样，水准不一，目的各异，得失互现。近代以前主要有古注解、朱注讲释、古义学、古文辞学、折中考证等接受、研究的方式与学术流派，但大体上与中国传统论语学的关联甚为紧密。近代以来的《论语》研究不仅积极采纳近代西方的学术方法，而且多以构建日本的近代学术和近代文化为旨归。研究的态度、目的、方法等已经与传统学术大不相同，出现了一些有别于以前的新态势。例如，武内义雄继承由狩野直喜所开拓的实证主义研究模式，同时抛开清考据学而大胆地进行“原典性实证研究”。^⑤又如，宫崎市定以史眼凌越清学、汉学，聚焦于原始儒学，并以近代语言学知识治校勘与训诂研究。又如，津田左右吉

① 张岱年. 孔子大辞典 [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3: 18.

② 严绍璁. 日本中国学史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424—428.
张士杰. 试论山路爱山的孔子研究 [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9(3): 120—128.

③ 严绍璁. 日本中国学史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429—438.
刘萍. 津田左右吉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72—287.

④ 严绍璁. 日本中国学史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441—448.
刘岳兵. 日本近代儒学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92—231.

⑤ 严绍璁. 日本中国学史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414—415.

虽然标榜尊崇孔子、还原孔子，实则一反传统经学视《论语》为经典的态度，而极尽怀疑之能事，甚至大肆否定《论语》文献，几乎瓦解孔子学说体系。再如，服部宇之吉虽然自任为孔子之徒，实际上却将《论语》等儒典歪曲诠释为天皇政治论的理论根源。^① 凡此种种，在研究态度、目的、方法、效用等方面都已经与传统注疏研究大相径庭，反映着《论语》研究在近代文化语境中和学术思潮影响下的新变化与新动向。因此，本研究属意于在与近代以前研究情况的对照之中，把握日本近代论语学的新态势。

四 研究内容及方法等

本研究拟以学术思潮为切入点，在学术思潮与论语学自身传统相结合的框架中，对近代日本《论语》研究的新态势进行学术观照，即通过考察和探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汇中的日本《论语》文献批评、思想研究及诠释的思路、方法、目的、效用、水准等情况，把握在不同学术思潮作用下的近代日本论语学的特质、流变以及新态势。质言之，本研究拟考察近代日本学术思潮作用下的论语学的新态势，借以厘清《论语》研究在近代日本的学术文化语境中的存在形态，理性地认识和思考彼国论语学在东西方学术融汇方面的实践及其是非得失，科学地分析和批判在特定学术思潮与时代背景中生成的《论语》诠释的真正意图与实质内涵。具体而言，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近代以前日本论语学作一简要的史学爬梳，借以明晰研究对象的学术源流，为历史地考察近代论语学树立学术参照系。日本有千数百年的《论语》接受史，源远流长，积淀丰厚。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

① 严绍疆. 日本中国学史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441—448.

刘岳兵. 日本近代儒学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2—231.

期里，其接受主体的构成、接受客体的形式以及接受的方式、水平、效用等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论语》或者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源泉，或者成为文学创作的思想题材，或者附庸于禅宗而获得兴盛，或者与武家政治相结合而被立为德川幕府的官学，或者遭受日本“国学”者的猛烈批判和排斥。凡此种种，异象纷呈，蔚为大观。不过，在《论语》播日后的千余年里，岛国学者的阅读水平几乎都停留在解读何晏《集解》和皇侃《义疏》的水平上。直至江户时代，在中国学术的刺激下，日本《论语》接受与研究的局面骤然生变。《论语》广播于列岛，释读之风尚颇盛，研究之业绩良丰。如林罗山、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大家辈出，如朱学、古义学、古文辞学、折中考证学等流派争鸣。研究水准也超越前代，并有优秀的学术成果逆向影响中国经学。近代以前的《论语》接受与研究，是《论语》在日本的际遇和命运的如实反映，也为近代的新变与展开奠定了扎实而庞大的学术基础，更是准确把握近代论语学特质与属性的绝好参照。因此，笔者拟对日本前近代，尤其是江户时期的《论语》接受研究情况与特质加以细致的考察和系统梳理。

第二，考察清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学术思潮双重浸润下的日本《论语》文献批评研究。“原典批判”是近代日本《论语》文献学研究的最大特征与精髓所在。狩野直喜继承清考据学，又引进法西实证论，开实证主义文本批评研究之风气。武内义雄承其衣钵，但治学思路更倾向于实证论，更为充分地运用“原典批判”这一利器，以翔实的论证大胆地稽考《论语》源流。他将现行本《论语》析解为齐鲁二篇本、河间七篇本、齐论语以及后世附加篇章等几个部分，并对各个部分的辑成年代、编纂者及传承者、流布地域等情况做了详细而精密的考证。宫崎市定在继承狩野直喜实证主义研究思想以及内藤湖南史学思想的基础上，在史学和语言学两个维度上对《论语》进行本文批评研究。在其《论语之新研究》一书中，宫崎以史学意识超越清学笃信汉儒的局限性，探究《论语》的原初面貌；他还利用近代语言学手段剖析《论语》本文，提出“误字”“脱字”“衍字”“错出”四个疑问，指出训诂方面的“句读”

“引文”“文意”及“语义”等几种问题。武内义雄、宫崎市定的研究中既有可观的成果，也有值得商榷和需要质疑之处，但确实堪为近代日本《论语》实证主义文献批评研究的代表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探察近代日本论语学的学术特质与嬗变轨迹。

第三，考察近代国家主义和皇权论浸染中的日本《论语》诠释及思想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西风日劲，汉学渐衰。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另一方面，皇权政治论在儒学的躯壳里借尸还魂。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及斯文学会等假借儒学之名义，行鼓吹近代国家主义、皇权论之实。井上哲次郎在官方授意下撰写《敕语衍义》，为皇权政治驯化忠臣良民而摇旗呐喊，影响巨大，却极其恶劣，其实质就是对《论语》等儒典的忠孝观进行卑劣的盗用和恶意的解读，借以为日本皇权政治服务。服部宇之吉继承其师井上哲次郎的衣钵，并且走得更远。他极力神化孔子，鼓吹“孔子教”，致力于构建服务于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宇野哲人在对《论语》的诠释中，特别强调宋明理学的意义，强调“孔子之教”和“大义名分”，反对“异姓革命”，反对孟子的“民本”思想，其实质就是为皇权政治提供强力的思想与理论支持。通过考察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等人的《论语》诠释，笔者拟对日本《论语》诠释与近代国家主义、皇权政治之间的关系实质做一透视。

第四，考察批判主义及疑古思潮浸润中的近代日本《论语》研究情况。山路爱山的批判精神与津田左右吉的疑古倾向虽然貌似相近，但实质却大为不同。山路爱山以怀疑精神治儒家典籍的文献批评研究，实质上其批判的矛头直指鼓吹“忠君”的井上哲次郎一伙。津田左右吉标榜考察和还原真正的孔子思想，却通过对《论语》中孔子语录材料的否定，几乎瓦解孔子的学说体系，实质上其目的在于消除日本文化构建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山路爱山的批判颇具独立精神，但文献批评中也有矫枉过正之处。津田左右吉以儒家思想发展史考证《论语》文本的思路颇具科学的学术精神，但其论证和论点中却随处可见较为严重的疑古倾向和主观臆断的谬误。这些都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理性的剖析和客观的评判。

王晓平先生曾指出,“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①。诚哉斯言!日本的中国研究天然地属于日本学术的范畴,其根本目的在于如何面对中国大陆,在于构建日本的意识形态。日本人对《论语》的研究与中国《论语》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即岛国日本如何利用《论语》来进行本国本民族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构建。因此,尽管中日两国论语学界面对着同一个研究对象,但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也做了不同的研究、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鉴于此,本研究拟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日本中国学的学术视域中,对日本近代学术思潮浸染中的《论语》研究与诠释情况进行学术观照与思考。具体而言,本研究拟采用如下研究方针和手段:

第一,在论语学的维度上,采取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策略,针对代表性学术论著进行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考察近代日本《论语》文献批评、思想研究及诠释的内在特质。

第二,在历史学维度上,把握学术思潮与论语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廓清不同学者《论语》研究的思路、特质、目的及效用等情况的关联与微妙变化,从而审视、捕捉近代日本学术思潮激荡与递变之中的《论语》研究的新态势。

第三,在比较文化研究的学术视域中,探查《论语》在近代日本的际遇。日本的《论语》研究与诠释属日本意识形态范畴,我们可以借助此种研究,在人文学术层面对日本文化施以冷静的审视和理性的认识。

第四,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研究将以文本分析与史论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文献学、考据学、诠释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理论,对研

① 王晓平.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中国学文萃》总序[N].中华读书报,2006-07-05(18)。

究客体考其详细，辨其是非，论其得失。

日本近代的《论语》研究由传统论语学、西方近代学术和日本民族文化三位一体而成，是个异常复杂的学术文化综合体。研究主体是近代日本的学者，研究客体是中国的典籍《论语》，研究方法颇有西方近代学术的性质。然而，究其实质，当然还是属于日本学术范畴的，其根本目的在于发展日本文化和构建日本意识形态。观其研究的表现形式，既有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多见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乃至有邪恶的政治图谋。念及于此，笔者心底不禁生出一股“如履薄冰”般的惊惧。惊惧的来由，在于此种研究时时有两种危险的倾向相伴左右。如果不加甄别地一味“拿来”，不加拣选地进行介绍和研究，则易使谬误流播，非但无益于观察他者，更难资于借鉴。相反，若是不假思索地一味排斥，则难免会漏掉有益的成果，于观察他者和观照自我而言，亦非明智。然而，危险往往与机遇携手而行。若能有效克服以上两种较为极端的思维方式及其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则很可能于纷乱繁杂的学术文化现象之中抓住本质，从而形成科学的认识，做出公允的判断。

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立场。笔者决意竭尽心力，固守科学的、学术的立场，进行客观的考察和理性的分析与批判。